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社会学文库
Sociological Library

主编/郑杭生

Social Bases for Environment Friendly Society:
Empirical Studies on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Behavior of Urban Residents in China

洪大用 等/著
肖晨阳

环境友好的社会基础

中国市民环境关心与行为的实证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Social Bases for Environment Friendly Society :
Empirical Studies on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Behavior of Urban Residents in China

环境友好的社会基础

中国市民环境关心与行为的实证研究

洪大用 肖晨阳 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环境友好的社会基础：中国市民环境关心与行为的实证研究/洪大用等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9
(社会学文库)
ISBN 978-7-300-16438-0

I. ①环… II. ①洪… III. ①市民-环境意识-研究-中国 IV. ①X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6502 号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社会学文库

主编 郑杭生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环境友好的社会基础

——中国市民环境关心与行为的实证研究

洪大用 肖晨阳 等著

Huanjing Youhao de Shehui Jich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9.625 插页 2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65 000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社会学文库
Sociological Library

主编/郑杭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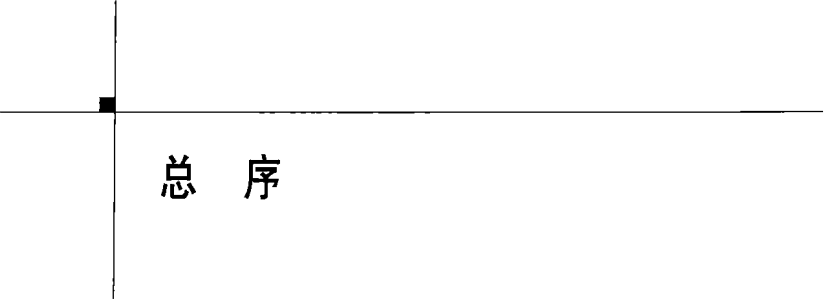
社会学文库

编 委 会

主 编 郑杭生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广海	王思斌	王雅林	包智明	田毅鹏
孙立平	刘少杰	刘世定	刘祖云	关信平
庄孔韶	江立华	李培林	李 强	李路路
苏国勋	沈关宝	宋林飞	吴忠民	张 静
周晓虹	洪大用	侯钧生	郭于华	郭志刚
黄 平	景天魁	景 军	蔡 禾	潘绥铭
戴建中				



总 序

现在，文库不少，社会学文库也有几个。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委托，主持一套社会学文库，就不得不追问自己：这套文库只是单纯在数量上增加一个文库而已，还是应该在质量上力求有自己的某些特点？这就是本套文库不可避免要面对的定位问题。经过考虑，本套文库的定位至少涉及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它是一套研究性的文库。就是说进入本套文库的著作，必须是研究性、探索性的。研究性、探索性的必备要素是与某种新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即有某种创新性，因此，它们不同于一般资料性的、介绍性的、编译性的作品。这并不是说后者不重要，而是说，因为类别不同，后者应该有自己的出版渠道。

社会学研究无疑涉及诸多方面，有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对现实社会现象的研究，又有对社会学本身的研究，等等。本文库欢迎一切真正有研究的著作；同时，根据社会学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要求，根据本国的国情，把重点放在如下几个方面：

- 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的研究著作。
- 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的研究著作。

——对世界社会学的新发展和走向有所把握的研究著作。

第二，它是一套精品性的文库。就是说，在研究性的著作中，我们更看重精品之作。所谓精品，在内容上至少要符合下述几条中的一条或同时具有：一是能够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公认有真知灼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二是能够对实现“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社会学深层理念有所贡献。三是对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有所推动。四是对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有所促进。而在形式上，要有与内容相匹配的叙述形式，要有较好的可读性，力求深入浅出，尽可能雅俗共赏，为大家所喜闻乐见。

第三，它是一套使社会学界新生力量脱颖而出的文库。就是说，通过研究性的精品之作，使那些在社会学界没有什么知名度，或知名度不高的“无名小卒”、新生力量、后起之秀程度不同地提高知名度，把他们实实在在地介绍给学界和社会，使他们尽快成为学界名人，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库也许能够成为培养社会学人才的有效渠道之一。众所周知，没有或缺少新生力量的学科和学界，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这当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可以忽视现在的学界名人，他们是我们最重要的依靠力量，他们负有提携后进的重任。我们真诚希望现有的学界名人和即将脱颖而出的学界名人，共同使本文库成为名副其实的名人文库，在学界和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四，它是一套供不同学派观点争鸣的文库。一个没有不同学派争鸣的学界，不能说是成熟的。我在社会学界多次强调“要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因为学派之争是学术问题、学术观点的争论，用的是学术标准，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过后仍然是朋友；宗派之争则用非学术标准，党同伐异，大有“谁不和我们歌唱，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的“气概”。因此，学派之争，与人为善，相互切磋，推进学术；宗派之争，与人为恶，相互攻击，阻碍学术。如果本文库在促成不同观点的社会学学派形成方面、在促成不同学派展开富有成果的争鸣方面，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我们将会感到非

常高兴和欣慰。本文库将对各种不同观点的学派一视同仁。

总之，我们真诚希望本文库能够出研究成果、出精品、出名人、出学派。简言之，我们把“四出”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会学文库的定位。

古人曾说过这样的意思，定位于“上”，可能得乎“中”，定位于“中”，可能得乎“下”。本文库这种“四出”的定位，从目标上说应该属于“上”，但结果仍有两种可能：或“上”或“中”。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前一种可能，避免后一种。最后究竟如何，当由读者和时间来鉴定。

应当指出，本文库是在一个不平常的时候出版的。

首先，无论是就政策环境和体制条件来说，还是就国内氛围和国际环境而论，中国社会学正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大有可为的发展时期。现在，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即作为要加强的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之一，得到了确认。人们越来越体会到社会因素即非经济因素对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性，从而也认识到以非经济因素为切入点的社会学，也和以经济因素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一样，是一门与每个人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学问，是一门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科学，感受到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和解读，并领悟到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是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社会政策的基础环节。人们对社会学从不了解、不甚了解甚至误解到逐步了解；一些社会学的用语（如社区、社会化、弱势群体、社会转型、良性运行等）日益普及化、大众化，其中一些还被政府部门所采纳和使用。这使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不仅有了自上而下的体制条件，而且有了自下而上的社会氛围。经过激烈竞争，中国社会学界获得了第三十六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的主办权，该届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将于2004年7月在北京召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承办。现在欧美社会学界都十分关注中国的变化、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无疑，在世界社会学的格局中，与欧美强势社会学相比，无论从规模、投入，还是从成果、影响等方面说，中国社会学仍然是弱势社会学。强势社会学界如此关

注中国社会的研究，对植根于本土社会的中国社会学界来说，既是一种沉重的压力，同时又是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版本文库，应当说是正当其时。我们希望不要辜负这样好的条件。

其次，这种不平常性还表现在世界社会学正处在自我反思和重建的过程之中。这种自我反思和重建的趋势并不是凭空而生，而是有现实根据的。这就是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我认为，这种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既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又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关于这一点我想多说几句。

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社会与个人不和谐，社会和自然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20世纪向21世纪的过渡时期，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人们看到：人类对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导致了天人关系的紧张，甚至“人类对自然的战争，变成了人类自我毁灭的战争”；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所引发的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又不能不导致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恶化。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这样，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

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赢、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涵。

就两种类型的现代性与社会学的关系而言，过往的旧式现代性锻造了以往的社会学——它的感受力和想象力、设问和眼界，甚至它的理论抱负和期望所能达到的限度。当现代性面临重大转折之时，必定也是社会重构、个人重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重建之日。社会学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经历预设的根本变化、视野的重

大调整、理论的重铸和再生过程。

对旧式现代性作出反应的，不仅有新型现代性，而且还有后现代性。如果说，新型现代性是对旧式现代性的一种积极、正面意义的反思，那么，主张后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则一般是对旧式现代性的一种消极、否定意义的反应。后现代主义批评旧式现代性的弊病是对的，但它的解决方法不是革除弊病，而是连现代性也加以抛弃，从而走向了极端。它对社会和知识基础的所谓“解构”，无助于增进社会的和谐。

因此，处在这样一个旧式现代性步入没落、新型现代性勃然兴起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学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跟上世界社会学重建的步伐，结合中国的实际，在理论研究上开拓出新的学理空间。而经过我国快速转型期独特经验的熏陶，中国社会学界的主体性、自觉性和敏锐性已经大为提高，将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

我们也真诚希望，本套文库能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促进作用。

以上权且作为本文库的序言，与大家共勉。

郑杭生

2003年8月于气和文轩



前言

几经周折，本书终于付印了，这应该是件很开心的事情，但是笔者却开心不起来，因为实在是觉得有点太拖延了。在此，笔者带点回忆的色彩对本书作一些介绍，以便读者进一步阅读。

一、环境关心研究的重要性

要说本书的来龙去脉，还得回到 2003 年。对于彼时已有记忆的人来说，那个年份注定是终身难忘的。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灾难，几乎让全国人民在一段时间内都身处不安、焦虑乃至恐惧之中。但是，这场灾难也唤起了政府和公众的风险意识，成为转变发展观、推动一系列社会变革的一个契机。正因如此，对于那些彼时尚无记忆的人而言，最终也将了解并记住那一年、那件事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政府对于应对突发事件的制度设计、对公共卫生体系的改革与重建，乃至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对完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视、对各项社会事业的推进、对传统发展观的反思与转变，都可以说与“非典”事件所唤起的风险意识有关。如果

没有显著增强的风险意识作为采取行动的驱动力，一些社会变革可能会再迟缓些。由此可见意识对于行动的重要性，尽管它在本质上决定于存在。本书研究的缘起和基础资料都与 2003 年密切相关，这在后文将进一步阐述。

本书主要研究公众（局限于市民）环境关心。在不同的文献，“环境关心”也被用作“生态意识”、“环境态度”、“环境意识”等。为了与国外同类研究更好地对话，我们在本书正文分析中更多采用的是“环境关心”的概念。尽管不同的概念之间有细微的差别，但我们未加深究，基本上把它们看作同义词，即都是指人们意识到并支持解决涉及生态环境的问题的程度以及个人为解决这类问题而做出贡献的意愿。在下文中，我们有时会混用“环境意识”、“环境态度”与“环境关心”的概念。

我们之所以专门研究环境关心，就是因为认识到了它对推动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首先，对于环境关心的研究解释了环境问题的“主观”层面或者“社会”层面，它可以与客观的环境监测数据相对照，共同反映一个社会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状况。通常，环境状况的改变自身是一个物理化学过程，对于这一过程是否构成必须通过社会努力来加以解决的“问题”，则取决于社会对这种状况的“定义”。而环境关心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这种“定义”的状况。对于环境关心的研究是环境问题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这种研究有助于揭示一个社会中究竟将哪些环境状况视为“环境问题”，或者说特定的环境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事实”。显然，没有这一部分的研究，对于环境问题的研究就是不充分、不完整的。

其次，无论是在个体层面，还是在集体层面，环境保护的行动是否发生取决于很多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必要的环境关心水平是行动发生的前提。可以说，有了必要的环境关心，不一定必然地导致环境保护的行动，因为从关心到行动的转化还受到制度安排、文化环境以及特定情境等的影响；但是，没有必要的环境关心，就不可能有自觉的环境保护行动。所以，我们重视对环境关心的研

究，有助于了解社会成员关心环境问题、支持环境保护的程度，从而促进对环境保护行动的更好的理解，同时得到有关提升公众环境关心水平的规律性的认识，以便更好地推动环境保护工作。

再次，环境破坏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所以推动环境保护、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也要依靠人类自身的行为调整。但是，迄今为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自觉地关注环境状况并支持环境保护。因此，从环境保护工作的角度来看，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确定社会中哪些成员更为关注环境问题、更为支持环境保护，以便把握环境保护的社会基础，为扩大社会基础、识别环境保护的社会动力以及更加有效地培育环境保护的社会力量提供重要参考。对于公众环境关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着眼于此，并对此有着积极贡献。

此外，环境政策对于促进环境保护有着重要意义，很多的研究者因此更加强调开发政策工具的重要性。但是，任何政策工具如果最终没有与公众的行为有机结合起来，就很难发挥有效作用。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外部政策的强制只有转化为行动者的自觉意识，才有可能切实体现在行动的改变上。我们在社会转型期所推动的很多环境保护政策都具有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强制性约束的特点，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遭到扭曲，难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应有作用。理解这种现象必须与行动者的环境关心水平联系起来，进一步完善环境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到行动者的环境关心状况；而通过研究得出有关环境关心成长的科学认识，则有助于促进环境关心，创造自下而上、自内而外推动环境保护的社会基础。

最后，相较于制度主义的观点，研究环境关心实际上体现了对社会行动者自身的关注，看到了行动者自觉努力的价值，展示了一种通过积极行动以促进环境保护的倾向。虽然结构性的、制度性的变革对于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过分宣扬这一点，就走向了结构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并在实际工作中容易导致两种消极的社会后果：一是让公众觉得变革的难度太大，以至于削弱乃至丧失了行动的积极性和对未来的希望；二是弱化人们采取行动的责任感，

让一些人产生了搭便车的心态，强化了人们的依赖、等待心理。由此观之，公众环境关心和行为的研究，对于实际的环境保护工作和环境社会学的学术社区而言，都具有别样的倡导意义。事实上，在整个社会学界，面对当今充满不确定性风险的社会现实，学者们越来越关注人的能动性，关注行动中的人，关注人们行动对于社会结构的重构和再造。虽然社会结构对于个人有着制约作用，但是学者们日益意识到人类并不完全为其所主宰，社会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行动和想象。

大概正因如此，在西方环境社会学发展过程中，有关公众环境关心和行为的研究一直是个重要领域。学者们关注如何测量和描述公众的环境关心，比较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类型公众的环境关心差异，探讨影响公众环境关心的各种条件与机制，把握环境关心发展变化的本质规律，目前已经积累了不少文献、知识和理论。

例如，有的学者曾经对西方相关文献在个人层次上的一些研究假设进行过归纳，包括年龄假设——年轻人比年长的人更加关心环境；社会阶层假设——随着人们文化程度、收入水平、职业声望的提高，社会地位与环境关心呈正相关关系；居住地假设——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为关心环境；政治假设——自由主义者比保守主义者更为关注环境质量；性别假设——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更多的环境关心。这些研究假设有的得到过证实，有的在各种研究中没有获得支持。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也尝试对环境关心的产生和发展提出更加系统性的理论解释，形成了诸如污染驱动解释、社会结构解释、世界观解释、后物质主义解释、建构主义解释等理论解释模型。其中，污染驱动解释认为，一个地方的污染程度比较严重或者有特殊的污染事件发生，当地居民可能会有较高的环境关心；社会结构解释认为，公众环境关心的成长与社会结构及其变动密切相关，特别是一个社会中的性别差异、阶层分化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影响着公众环境关心的不同表现；世界观解释认为，人们不同的世界观引导着不同的环境关心和政策偏好；后物质主义解释认为，环境关心与公众收入增长和生活水平改

善相关，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可能具有较强的环境关心；建构主义解释认为，特定的社会过程与机制唤醒并强化了公众的环境关心，影响着人们关注的重点和持续性。毫无疑问，这些已有的研究构成了本书分析的重要基础和出发点、参照系。

二、环境关心研究的历程

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笔者对环境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也主要是从环境关心（意识）开始的。1995年，在李强教授的领导下，笔者有幸参与中华环保基金会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进行的“中国公民环境意识调查”项目，直接带领学生开展入户调查，并执笔起草调查报告，后来更进一步地编辑成书，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现在看来，那时由于对国外研究了解太少和缺乏与之相应的理论意识，即使对环境意识概念的界定和所设计的测量方法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但是整体分析是比较肤浅的，没有与国外已有研究展开对话。1997—1999年，在李强教授与日本东海大学年度合作的课题中，我们也在北京市开展了几次环境意识调查。由于那时笔者已在忙于博士论文写作，并且所获得的数据只是区域性的，所以，在写作过程中，笔者尽管了解了一些西方学术界的环境意识研究，但并没有对那些数据进行深入分析。

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联合香港科技大学发起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为笔者在有一定知识储备的基础上开展更加规范的环境关心研究提供了一个宝贵机会。在时任社会学系主任的李路路教授的支持下，笔者结合对国外相关研究的了解，设计了包括21道问题的环境模块，并在令人恐惧的“非典”事件平息之后作为B卷随主问卷一起付诸调查。这次调查覆盖全国范围内的城市。调查利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PPS抽样从省级单位抽到社区，再在每个社区采用系统抽样抽取10个调查户。每户采用Kish表抽取1人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对象为18~69岁的成年人。调查方式为入户面访，设计样本5980人。虽然由于合作方的困难，在广东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湖北省的部分样本城市没有能

够进行B卷的访问,使得完成的样本比设计的样本少了902人,其中有效样本5073人,同时调查也没有包括农村地区;但是,这次调查毕竟是国内首次全国范围的严格进行抽样的入户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十分宝贵,可以据之对中国市民的环境意识进行科学分析。

这次调查结束之后,笔者很快对数据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利用。《江苏社会科学》在2005年第1期发表了笔者的一篇描述性分析文章——《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但是笔者对此感到很不满足。记得当时笔者曾组织了一个以2004级硕士研究生张莉彬、万惠仪、李棉管和郭淑华为主要成员的课题小组,进一步阅读和搜集相关文献,准备进行更多的分析。可惜的是,当时的硕士研究生已经变成两年制,时间仓促,笔者本人也于2006年年初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访问进修,没能很好地衔接上。

不过,2006年的出国确实为笔者提供了更多广泛地阅读文献、深入思考问题和开展研究的时间,收入本书的第一、二章的主要内容都是在那期间完成的。更重要的是,笔者在美国受到了美国环境社会学重要创始人之一邓拉普(R. E. Dunlap)教授的热情接待,并通过他认识了他的学生,当时还在奥尔布赖特学院(Albright College)教书的肖晨阳博士。我们相谈甚欢,共同对深入分析2003年的调查数据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笔者又与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攻读环境社会学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生卢春天建立了联系,彼此同样趣味相投。就在访问期间,笔者萌生了进一步申请课题,保证持续研究,努力在中国公众环境关心研究领域出版一本具有国际性标杆地位的著作的想法。

也许是幸运,2007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招标发布了一项课题:“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社会学研究”,这让笔者看到了争取项目支持的机会。但是,这个招标题目看上去很大,从实证的角度看,近乎无法操作。首先,“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就是两个稍微有些区别的概念,但是二者之间又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其次,即使将“资源”看

成“环境”的组成部分，将两个概念合并成“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样一个概念，它也是非常复杂的整体性概念，反映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建设这样一种社会，涉及人口、技术、生产、生活、城市、农村，或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全面调整和变革，当然也包括价值观念的变革，研究难度很大。再次，题目中的“社会学研究”过于宽泛，考虑到社会学视角和理论的多样性，简直是无从下手。当然，若在纯粹文献和理论的层面作些梳理，也是可以写出一些东西的，可这不是笔者当时所打算做的。

为了争取以上项目支持的机会，笔者所采取的策略是分步骤操作化。首先，将“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简化管理为“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时将建设这样一个社会的关键问题理解为环境治理结构问题，以针对当时相关研究对“由谁来有效推动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这一重要疑问的忽视。接下来再详析中国环境治理结构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根据以前的研究，笔者认为问题主要是政府力量和公众力量严重失衡，作为环境治理之应然主体的公众没有受到切实的重视，公众自觉参与环境治理还非常不足。这里面既有各种制度安排缺失或不当所造成的诸多参与条件和机会限制的影响，也有公众自身环境关心水平不足的影响。由此，笔者感觉找到了与已有研究基础相关联的一个切入点。从前文提到的环境关心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来看，笔者认为这个研究切入点是非常合理的。

因此，笔者当时在项目申请书中写道：“在一定程度上，本课程可以更进一步地准确表述为：中国环境治理中的公众意识与行为。这样一种研究既能体现社会学对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进行研究的一种视角，特别是环境社会学的一种重要视角，又能更加有针对性地推动中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在进一步的研究设计中，笔者从操作意义上将本项招标课题定位于以研究“中国公众环境意识与行为”为主，试图通过对中国公众环境意识与行为的实证分析，揭示中国公众环境参与的现状、特点以及参与不足的深层原因，探讨通过促进公众参与以优化中国环境治